



第七章 建议

| | |
|------------------------------|-----|
| 7.1 全球委员会建议分析的启示 | 98 |
| 7.2 证据委员会的建议 | 101 |
| 7.3 全球委员会建议分析的详细结果（第7.1节的附录） | 110 |
| 7.4 参考文献 | 114 |

本章探讨了我们的25位委员的工作核心：在应对社会挑战时，需要采取哪些更好或不同的方式使所有决策者对证据的使用系统化？它首先询问我们可以从之前众多的全球委员会中学到什么。最后提出了对前进道路的建议。

版权所有©2022麦克马斯特大学。保留所有版权。本报告采用创作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证授权。未经出版商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改编本报告的任何部分。

本报告和其中包含的信息仅供参考和公共利益所用。虽然秘书处和委员们已努力确保撰写本报告时信息是最新和准确的，且按原样发布，无任何形式的明示或暗示担保。本报告中包含的信息并非用于替代财务、法律或医疗建议。

麦克马斯特大学、证据委员会秘书处、委员们和出版商对因使用本报告中包含的信息而直接或间接造成或据称造成的损失或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麦克马斯特大学、秘书处、委员们和出版商明确否认因使用或应用本报告所含信息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本报告的出版商是麦克马斯特卫生论坛（McMaster Health Forum）（地址：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市主路西1280号米尔斯纪念图书馆417号，1280 Main St. West, MML-417, Hamilton, ON, Canada L8S 4L6）。麦克马斯特卫生论坛代表证据委员会，欢迎读者对本报告提出任何反馈和影响报告建议途径的意见。请将您的意见或建议发送至邮箱 evidencecommission@mcmaster.ca。

本报告的引用：

应对社会挑战的全球证据委员会。第七章：建议。证据委员会报告：为决策者、证据中介和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证据生产者敲响警钟并指明前进道路 [Chapter 7. Recommendations. The Evidence Commission report: A wake-up call and path forward for decision-makers, evidence intermediaries, and impact-oriented evidence producers]. 汉密尔顿：麦克马斯特卫生论坛，2022年；p. 97-114.

ISBN 978-1-927565-39-1 (Online)

ISBN 978-1-927565-33-9 (Print)

7.1 全球委员会建议分析的启示

对自2016年1月1日以来报告的48个全球委员会的建议进行主题分析有助于：

- 至少站在全球委员会权威成员的角度，了解我们在利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方面所处的位置与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的差距
- 改进证据委员会建议的框架，并确定有助于弥合这一差距的新想法
- 确定证据委员会的建议与其他全球委员会的建议一致。

我们在信息图中总结了主要结果，并在其下方的文本和[第7.3节](#)中进行了详细说明。



提出了**1460**条建议，其中许多建议涉及实现变革所需的“策略”

- 这些策略包括全球峰会认可的战略框架和相应的行动方案、自愿措施，例如指南、监测和改进方法、规划和供资机制、技术和财政支持、现有机构内部或涉及现有机构的新协调中心，以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



242条建议提及证据提供（第四章）

- 这些建议大多呼吁增加数据收集和共享，这是（但不等同于）数据分析作为证据形式的基础
- 当涉及其他形式的证据时，建议倾向于要求增加新证据的流动，如新的评估，但并未呼吁改善此类证据流动的信噪比，更好地利用现有的证据储备，或结合多种形式的证据



94条建议描述了政府官员、组织领导、专业人士和公民进行决策的环境（第三章）

- 这些建议很少涉及决策者能够或应该如何使用证据来应对社会挑战



50条建议涉及证据中介（第五章）

- 这些建议往往要求联合国系统更好地发挥其规范作用（如指南）和咨询作用（如对其成员国的技术支持）
- 证据很少被明确为这种作用的必要基础



28条建议涉及全球公共产品和分配能力（第六章）

- 一些全球委员会呼吁加强世界银行在支持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发挥的作用
- 几乎没有提到与证据有关的公共产品，也没有提到在需要证据使用能力的各个层面（例如，联合国系统）进行适当的分工



10条建议提及我们如何理解社会挑战的性质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第二章）

- 少数建议谈及如何构建社会挑战，使其更有可能产生行动，以及如何应对社会挑战，使行动更有可能产生影响

在2016年1月至2021年9月期间，48个全球委员会发布了70份报告（其中一份是临时报告），共提出1460条建议，平均每个委员会提出30条建议，每份报告包含21条建议。报告的完整清单见附录8.1。

全球委员会的建议与证据委员会报告关注的重点一致，即证据提供（即242条建议与第四章相关）。这些建议大多要求增加数据收集和共享，这是将数据分析作为一种证据形式的基础，但它们：

- 很少关注收集内容的简洁性，数据和数据分析质量，以及数据共享的及时性
- 似乎认为可靠的数据分析将会开展，然后将分析结果用于形成决策，支持问责制，包括关注公平性
- 没有阐明数据分析最适合解决哪类问题，也没有阐明哪类证据能够回答决策所需的其他类型问题。

当涉及其他形式的证据时，建议倾向于要求增加新证据的流动，如新的评估，但并未要求改善此类证据流动的信噪比，更好地利用现有的证据储备，或结合多种形式的证据。一些全球委员会要求进行评估，其中五个明确要求评价什么是有效的，一些委员会呼吁评价多个领域（如健康、经济和环境影响）和时间范围的影响。很少有全球委员会呼吁开展行为/实施研究，尽管有时会呼吁开展活动和其他战略，以改变可从此类研究中受益的行为。少之又少的全球委员会呼吁其他类型的证据，如建模、定性见解、证据综合和指南，以解决他们所关注的社会挑战。

在全球委员会的建议中，第二大类最常见的建议描述了政府官员、组织领导、专业人士和公民进行决策的环境（即94条建议与第三章相关）。这些建议很少涉及这些决策者能够或应该如何使用证据来应对社会挑战。

在这94条建议中，大部分要求政府政策制定者使用特定的政策工具或具体的结构和程序来应对社会挑战。小部分则要求组织领导，特别是企业领导人，使用具体的方法解决社会挑战；要求专业人士在政府和组织中独立应对社会挑战，要求公民在应对社会挑战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全球委员会的第三类最常见建议涉及证据中介（即50条建议与第五章相关）。这些建议通常要求联合国系统更好地发挥其规范作用（如指南）和咨询作用（如对成员国的技术支持），并要求联合国系统和其他“中介机构”使用特定类型的战略来支持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决策者应对社会挑战。证据很少被明确作为此类作用和战略的必要基础。

全球公共产品和产品分配能力很少成为全球委员会建议的重点（即28条建议与第六章相关）。一些全球委员会呼吁加强世界银行在支持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发挥的作用，并呼吁支持诸如互联网等全球公共产品。然而，这里面几乎没有提到与证据有关的公共产品，也没有提到在需要证据使用能力的各个层面进行适当的分配（如联合国系统及其区域办事处和国家办事处各自最擅长什么）。

改善我们对社会挑战性质和应对方法的理解，是全球委员会建议中最不常见的重点（即10条建议与第二章相关）。少数建议谈到了如何构建社会挑战，使其更有可能产生行动，以及如何应对社会挑战，使行动更有可能产生影响。这些建议还谈到，在应对社会挑战时，展望和创新是可以补充证据的领域。

本章末尾的附录（第7.3节）介绍了我们对全球委员会建议进行主题分析后更详细的结果。调查结果从实现变革所需的策略开始——即在起草诸如证据委员会的建议时可以考虑的一系列措施和机制。在这些策略中，只有一些是关于其有效性的证据综合主题。其余的研究结果按照本报告各章的重点来组织。

我们对全球委员会报告的分析还包括以下几点：

- 一份报告使用了易于改编的语言（正如我们在建议中所做的那样），以进一步支持证据的使用：联合国秘书长应就证据使用问题对联合国系统的所有部门提出明确期望，要求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实体概述如何建立内部能力和加强证据使用参与度的机构计划，并促进成员国获得更多可预见的技术支持，这些支持既基于证据，又能加强国家证据支持系统（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高级别小组）
- 另一份报告也使用了易于改编的语言（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他们提出在支持证据使用时应警惕以下几点：资助者应将其支持与国家的证据支持系统战略保持一致，并避免为大量小规模或纵向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时代《柳叶刀》优质医疗体系委员会）
- 一份报告使用的证据是指法律证据，而非研究证据（媒体自由问题高级别法律专家小组）
- 一份报告通过强调考虑跨领域（交叉）关系和等级制度的重要性来处理公平问题（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小组）
- 一份报告呼吁在制定以社区为基础的战略时利用原住民和地方性知识（关于实现2030年议程的国际金融问责制、透明度和完整性的高级别小组）
- 一份专门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报告错失了呼吁将多种形式的证据，以及证据支持系统纳入拟议的全球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的新架构中的机会（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
- 许多报告的建议都引用了与其重点领域相关的颜色（例如，绿色债券代表环境，蓝色基金代表水，以及红色清单代表濒危物种），或表明需要采取的行动（例如，停止进行红色清单中的事情）
- 一些报告采用了有助于起草证据委员会建议的格式（境内流离失所问题高级别小组；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代《柳叶刀》优质医疗体系委员会）。

7.2 证据委员会的建议

前面的章节提供了支持以下建议的环境、问题、潜在解决方案和共享词汇。这些章节可供多人使用，而不仅仅是那些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然而在这里，我们把重点放在那些最有能力做出必要变革的人，以确保通过一致的方式使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这主要包括：

- 多边组织，如：联合国系统、多边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二十国集团（G20）等
- 国家和次国家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者
- 组织领导、专业人士和公民
- 证据中介，包括那些目前不充当证据中介的人员（例如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
- 证据生产者，特别是那些从事生产和支持使用数据分析、建模、评价、行为/实施研究、定性见解、证据综合、技术评估/成本效果分析和指南，并以影响力为导向的单位。

在此，我们以信息图的形式概述了证据委员会的24条建议，并于下方表格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八条最重要的建议（1、3、4、5、13、14、15和24）使用粗体表示。它们的重要性源于它们如何提供框架[1，4，13]、结构和流程[5，14，15]、责任[3]或资金[24]，许多其他行动可以遵循这些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这些建议（如报告的其它部分）中使用“证据”一词表示研究证据，特别是第四章中描述的所有八种形式的证据（数据分析、建模、评价、行为/实施研究、定性见解、证据综合、技术评估/成本效果分析和指南）。我们使用的“最佳证据”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或次国家）背景下——从最佳可用研究中得到的国家（或次国家）证据（即在背景下学到了什么）和从最佳可用证据综合中获得的全球证据（即从世界各地学到了什么，包括其不同群体和环境下的差异）。



所有可以采取行动的人

两条建议，一条是**警示**[1]，另一条是提出新的回应标准，即任何时候提出的主张（如这种干预措施是有效的）要求提供证据时的回应标准[2]



多边组织

两条建议，一条呼吁**多边组织做出决议**[3]，另一条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4]



政府政策制定者

七条建议：

- 四条呼吁建立符合目的的国家（和次国家）**证据支持系统**（和更广泛的证据基础设施）[5]、证据支持人员和伙伴关系[6]、科学顾问[7]和咨询机构[8]
- 一条呼吁建立更多样化的证据库[9]
- 两条与开放科学[10]和人工智能[11]相关



组织领导、专业人士和公民

两条建议：

- 要求每个重要的组织协会、专业机构和以影响为导向的民间社会团体对其国家（或次国家）的证据支持系统做出有意义的贡献[12]
- 一条是呼吁公民考虑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佳证据**的多种方式，并考虑支持能够实现这一点的政治家（和其他人）[13]



证据中介

三条建议：

- 一条针对**专门的证据中介**[14]，另一条针对**新闻和社交媒体平台**[15]
- 一个更普遍的要求是及时并响应迅速地将**最佳证据**与所提问题相匹配[16]



证据生产者

七条建议：

- 五条解决以下方面的作用：1) 填补空白并遵守标准[17]；2) 响应、转介或与他人合作[18]；3) 向其他部门的证据小组学习[19]；4) 为全球紧急情况做好准备[20]；和5) 使证据易于理解[21]
- 一条专门针对**学术机构**[22]，另一条针对**期刊**[23]



资助者

一条建议呼吁在**证据支持方面**支出“**更明智**”，理想情况下**更多**，尤其是在国家（和次国家）**证据支持系统**和更广泛的**证据基础设施**方面[24]

证据委员会提出以下24条建议。为更容易识别最重要的八条建议（[1](#)、[3](#)、[4](#)、[5](#)、[13](#)、[14](#)、[15](#)和[24](#)），它们前方附有一个包含建议编号的彩色圆圈，并包含在具有相同颜色外框的文本框中。对于每条建议，我们都列出报告的相关章节，提供支持该建议的环境、概念或词汇（按其介绍的顺序排列）。在相关的情况下，我们还列出了与证据委员会建议一致的全球报告。全球委员会的报告通常仅与建议的一部分或其理由相一致（如关注公平性，投资于某些特定形式的证据（例如评价）以及让决策者承担责任），而来自其他全球实体的报告往往更加一致。



所有决策者、证据中介和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证据生产者

1

敲响警钟—决策者、证据中介和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证据生产者应该认识到问题的规模和性质。政府政策制定者、组织领导、专业人士和公民并未系统地使用本报告中提到的所有八种形式的证据以公平地应对社会挑战。相反，决策者往往依赖于低效（有时是有害）的非正式反馈系统。结果则是糟糕的决策，导致无法改善生活，对公民造成可避免的伤害以及资源浪费。

参与COVID-19决策的决策群体，特别是高级别政府政策制定者，目前对使用多种形式的证据和利用支持其使用的策略有了直接经验。他们对导致证据被忽视或滥用等可能出现的挑战也有直接经验。他们可能还听说其他国家的同行可以获得的证据支持，如动态证据综合，并想知道为什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可获得或不可使用这些证据。这个群体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将大流行之前和期间成功经验系统化，并建立或改进各自国家的证据支持系统，以解决不成功的地方。

相关章节：[4.13](#)众多COVID-19证据支持系统的不足 | [6.2](#)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公平分配能力 | [4.1](#)决策中常见的证据形式 | [4.7](#) 动态证据产品

2

要求证据的新标准—当提出主张时，所有决策者都应注意并询问其所依据的证据质量和适用性。专家和其他提出主张的人（如这种干预措施有效）可能是依赖于他们的个人经验或现有证据的一个部分。他们可能对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事情过于自信。与其依赖专家作为唯一的证据来源，决策者也可以寻找最佳证据来源，如“一站式服务”，其中包含使用适当分类法组织的证据综合，且各部分证据在考虑质量、时效性和其他决策相关因素后评估。他们可以让专家发挥其他作用，如研究特定的证据综合对特定管辖区的意义，以及对不同形式证据的思维方式提出挑战。

相关章节：[4.5](#)高质量证据和低质量证据的区分 | [4.8](#)最佳证据与其他证据的对比（以及如何从其他证据中获得最大收益） | [4.11](#) 错误信息与信息疫情



多边组织

3

多边组织的决议—联合国、G20和其他多边组织应通过一项决议，使这些多边组织及其成员国承诺扩大其对证据的概念，并支持与证据有关的全球公共产品以及公平分配生产、分享和使用证据的能力。旨在支持联合国从2021年到2025年转型的“变革五要素”明确包括数据分析和行为/实施研究，隐含地包括评估（在“绩效和结果导向”下），但对其他所需的证据形式却未提及。(1)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包括它们赞助的全球委员会）继续依赖“专家最了解”的模式。联合国秘书长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振兴提供了一个可以做得更好的机会。(2)可以从那些率先采用更系统、更透明的证据使用方法的组织中学到很多东西，如：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指南审查委员会（制订规范性指南）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相关章节：4.2常见证据形式的定义|6.1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6.2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公平分配能力|5.5联合国下设机构在其工作中对证据综合的使用|7.1全球委员会建议分析的启示|**统一报告：**(3)

4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世界银行应在即将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专门提供全球、区域和国家所需的证据体系架构设计，包括对与证据相关的全球公共产品以及公平分配的证据生产、分享和使用能力的必要投资。世界银行向“知识银行”迈进的步伐过于试探性。他们迄今为止的工作强调了某些形式的证据（如数据分析），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其他形式（如证据综合）。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可以建立一种关于证据和证据使用的通用语言，即决策者、证据中介和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证据生产者等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它还可以列出许多做得更好的步骤，包括世界银行的作用，以及其全球伙伴关系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在支持与证据相关的全球公共产品（如证据综合）方面的作用。

相关章节：6.1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6.2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公平分配能力|1.6使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的关键事件时间线|**统一报告：**(4)



政府政策制定者

5

国家（和次国家）的证据支持系统—每个国家（和次国家）政府都应该审查其现有的证据支持系统（和更广泛的证据基础设施），通过内部和伙伴关系填补差距，并公开报告进展。例如，许多政府没有证据支持协调办公室、行为洞察部门、证据使用手册和相关指标，以及理想证据支持系统的其他特征（如4.14节所述）。每个政府还可以审查其“主流”结构和程序（如预算、规划、监测和审计），以正式确定证据的“输入方式”。若没有正确的证据支持系统，工作人员将没有能力、机会和动力在政府决策中使用证据。

一些政府可能会选择在立法中正式规定其效力，如美国的《循证决策基础法案》。许多政府还可以支持在组织领导和专业人士的日常工作以及公民的日常生活中使用证据，并在其工作中明确尊重原住民权益及其认知方式。

相关章节：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3.3政府政策制定者及其使用证据的环境|4.10原住民权益及其认知方式|**统一报告：**(3)

6

工作人员、合作伙伴和其他资源—政府政策制定者应确保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能够获得证据支持所需的工作人员、合作伙伴和其他资源。参与支持政府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项目、技术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即为政府提供证据“吸收能力”的工作人员）需要及时了解证据使用的进展。他们需要与专业的证据生产者和中介建立伙伴关系（包括技术支持安排），以补充其内部能力以及应用这些能力所需的其他资源（例如在线文件访问）。

相关章节：3.3政府政策制定者及其使用证据的环境 | 5.3证据中介使用的策略 | 6.2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公平分配能力 | 统一报告：(3-5)

7

科学顾问—政府政策制定者应根据以下能力选择他们的科学顾问：发现、本土化和交流不同类型的证据；维持高效能证据支持系统。许多科学顾问是根据他们过去的科学贡献或与高级政府官员的关系来选择的。就像政策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科学顾问需要紧跟使用证据的许多进展。此类证据包括本报告中讨论的八种形式的证据，来自健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以及跨部门的证据。其中许多类型的证据现在都可以作为动态证据产品。

相关章节：3.3政府政策制定者及其使用证据的环境 | 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 | 4.2常见证据形式的定义 | 4.7动态证据产品

8

咨询机构—政府政策制定者应在证据使用中对咨询机构提出更高的标准。许多咨询机构并未结合使用本土最佳证据（例如来自国家或次国家层面的数据分析）和全球最佳证据综合，也未将正确的证据类型与正确的决策相关问题相匹配。他们通常不使用稳健的审议程序，包括让那些能够从公平的角度解释证据对特定群体意味着什么的个人发言。他们通常也不会区分基于最佳证据的建议和未基于最佳证据的建议。

相关章节：4.4本土证据和全球证据的相互作用 | 4.3匹配决策相关问题与证据形式 | 1.7公平性考虑 | 4.5高质量证据和低质量证据的区分

9

建立更加多元化的证据库—政府政策制定者应补充其对数据收集和共享的一般支持，特别支持更多样化的证据库，以公平性为导向为决策提供信息。全球委员会报告一直在宣扬“大数据”的价值，但他们却没有指出什么是可靠的数据分析，数据分析可以用于回答哪些问题，以及如何用其他形式的证据来回答数据分析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也几乎没有提到需要更好地利用各种形式的现有证据，通过所有拟议的投资建立多元化的证据基础，并在共享现有证据和新证据时提高信噪比。

相关章节：7.1全球委员会建议分析的启示 | 4.3匹配决策相关问题与证据形式 | 4.5高质量证据和低质量证据的区分 | 1.7公平性考虑 | 统一报告：(4；6-13)

10

开放科学—政府政策制定者应激励开放科学，将其作为在决策中使用证据的关键推动因素。共享匿名数据、物理样本和软件（如用于建模的软件）—同时确保有适当的标准以确保数据隐私—使许多类型的数据分析和评估成为可能。解决导致接受公共资助的研究人员将证据综合等全球公共产品置于出版商“付费墙”之后的因素，将有助于决策者、证据中介以及其他证据生产者获得他们所需的证据。

相关章节：6.1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 统一报告：(14)

11

人工智能—政府政策制定者应确保人工智能（AI）的监管制度和持续的验证计划，以优化人工智能对证据支持系统的益处，并将其危害降至最低。机器学习和其他方法在数据分析、证据综合和其他形式的证据方面创造了大量的新机会，但也有很大的潜在危害。例如，这些方法可能会无意中延续或增加歧视的风险。政策制定者还可以与研究人员合作，确保这些分析方法得到透明报告、审慎复制、正确解释和使用。特别是，得出因果推论的能力往往被高估，导致在决策中做出不恰当的解释和使用。

相关章节:4.7动态证据产品|统一报告:(15)



组织领导、专业人士和公民

12

来自组织协会、专业机构和民间社会团体的贡献—每个重要的组织协会、专业机构和以影响力为导向的民间社会团体都应审查其对国家（或次国家）证据支持系统（和更广泛的证据基础设施）的贡献，通过内部和伙伴关系填补空白，并向成员报告进展。大多数组织以及几乎所有的专业人士和公民都需要能够依赖的证据支持系统，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解决利益冲突并避免“杜撰”。组织协会（如代表和支持学校董事会的协会）和专业机构（如代表和支持社会工作者的机构）可以成为国家（和次国家）证据支持系统的关键部分。民间社会团体可以要求所有这些团体对他们如何支持使用证据来解决社会挑战负责。

相关章节:3.4组织领导者及其使用证据的环境|3.5专业人士及其使用证据的环境|3.6公民及其使用证据的环境|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统一报告:(11;16;17)

13

日常生活中的证据—公民应考虑根据最佳证据就其及家人的福祉做出决定：把钱花在有最佳证据支持的产品和服务上；自愿为那些使用证据来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做的倡议投入时间和进行捐款；支持那些致力于使用最佳证据来解决社会挑战，以及那些承诺（与其他人一起）支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证据的政治家。除其他外，政府政策制定者需确保公民能够获得最佳证据、经证据核实的主张，以及易于使用的有证据支持的资源和网站等，以便在任何时候做出明智的选择，而不仅仅是全球危机期间。他们还需要帮助建立公民的媒体和信息素养，提供必要的透明度，让公民知道决策、服务和倡议是否基于最佳证据的，并更广泛地创造一种理解、重视和使用证据的文化。

相关章节:3.6公民及其使用证据的环境|4.11错误信息和信息疫情|统一报告:(3;5;10;16;18;19)



证据中介

14

专门的证据中介—专门的证据中介应该挺身而出，填补政府留下的空白，在政府工作人员频繁更替时提供连续性，并利用与全球网络的紧密联系。证据中介介于决策者和证据生产者之间，为前者提供最佳证据支持，为后者提供利用证据产生影响的洞察力和机会。与政府的科学顾问一样，中介需要能够发现和交流各种形式证据，并维持（至少是一部分）高效能的证据支持系统。COVID-19已经在某些国家的某些时候显示出中介与社区领袖合作的价值，即让那些过去可能因不当生成、共享或使用的证据而受到不良服务的人参与进来。

相关章节:5.1证据中介的类型|5.3证据中介使用的策略|4.2常见证据形式的定义|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1.7公平性考虑|统一报告:(8;20)

15

新闻和社交媒体平台—新闻和社交媒体平台应与可以帮助利用最佳证据来源的专门证据中介，以及可以帮助有效传达证据并确保其算法呈现最佳证据并抨击错误信息的证据生产者建立关系。新闻工作者和事实核查人员需要熟悉证据综合，并利用它们就获得的任何证据以及可用于替代最佳证据的任何“其他事物”提出具体问题。熟悉的证据综合包括：在更广泛的证据体系中本土化和定位新研究的重要性；与单一、小型、执行不力的研究相比，更倾向于综合高质量研究的理由；科学不确定性的概念；证据的演变性质及其与新兴和替代指南的联系；偏倚和利益冲突的重要作用和作用；以及避免“杜撰”报告的重要性。

相关章节:5.1证据中介的类型|4.4本土证据和全球证据的相互作用|4.8最佳证据与其他证据的对比（以及如何从其他证据中获得最大收益）|4.11错误信息和信息疫情|统一报告:(21;22)

16

及时和响应迅速地将最佳证据与所提问题相匹配—所有的证据中介都应以一种及时和响应的方式支持使用最佳证据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或考虑到决策者感兴趣的领域应提出的问题）。某些形式的证据可以帮助回答关于问题的问题（如数据分析）；其他形式的证据可能有助于回答关于解决问题的选择或实施策略的问题（如效益、危害和成本评估）。全球最佳证据的综合需要与本土最佳证据，以及其他类型的分析（如政策、系统和政治分析）相辅相成，以帮助理解影响证据是否以及如何被使用的背景因素。需要创新的新证据产品来描述最佳证据的组合。

相关章节:4.3匹配决策相关问题与证据形式|4.4本土证据和全球证据的相互作用



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证据生产者

17

填补空白并遵守标准—证据工作组应预测并填补各自证据形式的空白，且遵守其标准。很多优先主题没有可用的证据综合，而很多主题有较多的可用证据综合。很多证据综合质量低下且已过时。在全球大流行的近两年里，COVID-19的情况就是如此。

相关章节:4.6证据综合的覆盖面、质量和新近度|4.5高质量证据和低质量证据的区分|统一报告:(3;23)

18

响应、转介或与他人合作—证据工作组应发挥其比较优势，与具有互补比较优势的工作组合作，帮助在本国建立更好的证据支持系统和更好的全球证据体系架构。证据工作组可以响应与他们提供的证据形式最匹配的问题类型。他们可以将其他问题转交给其他工作组。他们也可以以集体影响为导向，与其他工作组合作以生产更多的综合证据产品。这些证据产品可以结合本报告中描述的多种形式的证据，来自健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以及跨部门的证据。证据工作组可以将判断力、谦逊和同理心带到他们所做的一切中，并鼓励那些共享和使用证据的人也这么做。

相关章节:4.3匹配决策相关问题与证据形式|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6.1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6.2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公平分配能力|统一报告:(3)

19

向其他部门的证据工作组学习—为适应其他部门的创新，证据工作组应该持开放的态度。Cochrane开创了許多方法来综合有关健康方面的研究，包括动态证据综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开创了許多方法来模拟人类长期引起的气候变化。Cochrane和IPCC可以相互学习，其他人也可以向他们学习。

相关章节: 4.4本土证据和全球证据的相互作用 | 4.7动态证据产品

20

为应对全球突发事件做好准备—证据工作组应确保在全球突发事件发生时，他们能够灵活地转向新的主题。许多COVID-19全球委员会在“新冠疫苗、新冠诊断和治疗”领域开展基础研究。他们没有阐述研究的目的，因为证据将决定这些产品能否应用于需要它们的人身上。专注于这些更广泛问题的证据工作组将不可避免地回到其现有的重点领域，但需要做好准备，便于重新关注一场大流行或其他全球突发事件。全球委员会也没有提出需要为随机对照试验和其他研究，以及国家证据支持系统和更广泛的全球证据体系架构（无论是“准备就绪”，还是已投入使用）制订计划书。

相关章节: 7.1全球委员会建议分析的启示 | 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

21

使证据易于理解—证据工作组应该准备“衍生产品”，将我们知道的内容（以及确信程度）以对目标受众有意义的方式传达出来。由于建模尚不存在类似于其他类型的证据质量标准，建模者需要充分公开分享其模型的详细信息，便于其他人进行评价（例如，模型的结构、使用的数据、一致性及其应用的软件或工具）。沟通方面的考虑包括决策者的信息需求、易于掌握关键信息并在有兴趣的情况下进行更深入挖掘的格式（有时称为分级条目）、通俗的语言措辞以及翻译成其他语言。

相关章节: 4.5高质量证据和低质量证据的区分 | 5.3证据中介使用的策略 | 统一报告: (24)

22

学术机构的责任—学术机构及其公共资助者应激励教职员为其国家（或次国家）的证据支持系统和与证据相关的全球公共产品做出贡献。现有的激励机制倾向于只奖励经过同行评审的资助和出版物，以及率先就某一主题发表的文章，而不是为更具权威性研究做出贡献。一些国家正在利用定期的机构评估活动来推动对证据影响的更多关注（例如英国卓越研究框架（UK's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额外的激励措施可以奖励实现影响所需的工作（例如，与决策者的接触和回应），并支持最佳证据（例如，优先考虑出版物的质量而非数量，以及交流来自证据体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单一研究的见解）。为了更清晰地了解资助者和慈善家，我们鼓励人们关注单一研究的媒体发布和媒体采访，而不是“为黄金时段做好准备”的最佳证据。

相关章节: 5.4证据中介的促进与阻碍条件 | 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 | 6.1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 4.5高质量证据和低质量证据的区分 | 4.8最佳证据与其他证据的对比（以及如何从其他证据中获得最大收益）

期刊的责任—期刊出版商应改进他们支持使用最佳证据的方式。期刊可以要求审稿人使用报告指南和严格评价清单，将单个研究置于证据综合的背景下，并共享匿名的研究数据。他们还可以承诺发表阴性的研究报告和复制的研究，避免“杜撰”，并在获悉学术不端时迅速采取行动。期刊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及时发布更新后的动态证据。期刊还需确保出版延迟不会妨碍决策所急需证据的公开共享（反之，公开共享也不妨碍未来在期刊上发表）。

相关章节：5.4证据中介的促进与阻碍条件|4.5高质量证据和低质量证据的区分|4.4本土证据和全球证据的相互作用|6.1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资助者

资助—政府、基金会与其他资助者理论上应在证据支持上“更聪明”，理想状态下应投入更多的资金。他们可以承诺确保将1%的资金分配给国家（和次国家）的证据基础设施（如第4.14节所述，为证据支持系统和证据实施系统提供合理的份额），同时监测标准的遵守情况。如果世界银行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等多边组织未承担分配这一责任，他们可以确保将10%的资金分配给与证据相关的全球公共产品。高收入国家政府和全球资助者可以将其国际发展资金的1%用于公平分配的证据使用能力。

相关章节：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6.1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6.2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公平分配能力|统一报告：(3)

正如两党政策中心的Nick Hart所指出的（在关于美国知证决策委员会、《证据法案》以及随后的行政备忘录的系列播客中也提及），即使两党经常无法就证据的内容和其对特定环境下的意义达成一致，也应该支持建立和使用证据。(25)

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世界各地的决策者（例如，政府政策制定者、组织领导者、专业人士和公民）都需要最佳的证据来应对社会挑战。为满足需要，我们不能只是为下一次的全球突发事件做准备，然后看着这些准备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转向其他挑战而被瓦解。世界需要一个灵活、方法强大且公正的证据基础设施，可以与为任何特定社会挑战带来特定专业知识的人相交。我们需要全球公共产品和公平分配能力来生产、共享和使用最佳的证据。我们一方面需要能力、机遇和动机，另一方面也需要判断力、谦逊和同理心。



政府政策制定者, Andrew Leigh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将经济学和法律培训引入公共政策写作和辩论

参与本报告的编写和委员之间的讨论改变了我的想法，即我个人可以做什么，我所在的国家需要做什么，以及我希望看到多边组织做什么。

就个人而言，第4.8节《最佳证据对比其他证据》（best evidence versus other things）是我最喜欢的部分。这里有很多关于如何从“其他证据”中获得更多信息的明智建议，像我这样的民选官员会定期收到这些建议，例如一份预印本、一位有意见的专家、一个提供建议的专家小组和一份辖区范围经验综合。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随机试验的书。而现在，在完成本报告后，我对随机政策评估的必要性更感兴趣。试验的优势之一在于它们很容易向公民解释，它们帮助我们解决公民对“技术官僚主义”的担忧，在这种担忧中，普通民众认为他们会被自己不理解的决策过程欺骗。对政府的信任不仅仅在于做出正确的决策，而在于做出公民认为正确的决策。

评估不是只与精英有关的问题。证据是为每个人准备的。我们的报告为个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建议。如果你是正在研究有关戒烟或减肥证据的个人，那么你应该查看证据综合，而非单一研究。如果你是一名撰写健康相关文章的新闻工作者，那么你可以成为Cochrane的常客，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数千个主题相关的精炼证据。对于报道社会政策的媒体，Campbell协作网可以提供同样的服务。我们的报告建议政府在决策中更好地使用证据，并通过严格的评估建立证据库。国际组织应更多地依赖证据，世界银行也应该准备一份关于证据使用最佳实践的里程碑式报告。

国际组织在证据的使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报告采用了非常严格的方法对有关全球变暖及其后果的证据进行筛选和分级。其他全球机构在证据的使用方面系统性较差，也较常依赖于单一的研究，且当存在大量同行评审文献时仅引用专家意见，或是在差别很大的环境下推断证据。这并非国际机构想要歪曲科学问题，他们反而热衷于改进，外部专家可以基于各个机构所公布的如何使用证据决策对报告进行评估，从而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正如第5.5节所述，从2007年开始，“点名羞辱”对世界卫生组织（WHO）使用证据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联合国系统的其他部门也需要效仿WHO的领导。

在慈善组织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高质量的评估可以创建一个良性循环：让无效的项目逐渐减少，有效的项目扩大规模。快速发展的有效利他主义运动要求慈善机构为其影响力提供严格的证据。例如，据GiveWell.org估计，对于两个一流的慈善机构（抗疟疾基金会和疟疾联盟），其项目每增加4500美元，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这是捐助者支持这些慈善机构的强大动力。更多来自其他慈善机构直接影响的证据可能有助于推动良性竞争和发展。





7.3 全球委员会建议分析的详细结果（第7.1节的附录）



| 领域 | 主要结果 |
|-------------|-----------------------------------------------------------------------------------------------------------------------------------------------------------------------------------------------------------------------------------------------------------------------------------------------------------------------------------------------------------------------------------------------------------------------------------------------------------------------------------------------------------------------------------------------------------------------------------------------------------------------------------------------------------------------------------------------------------------------------------------------------------------------------------------------------------------------------------------------------------------------------------------------------|
| 带来改变的策略 | <p>许多全球委员会呼吁采取广泛的措施和机制以促进变革，包括：</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全球峰会认可的战略框架-建立共享的术语表和目标，并就近期和长期的优先事项作出战略选择-和配套的行动纲领和问责框架（或联合国特别会议），以及区域峰会认可的实施计划自愿措施，例如行业规定、标准、指南、程序、工具包和“政策对话”监测和改进方法，如指标、基准、目标、功能支出审查、独立评价和高绩效者简介规划机制，如多部门预算编制和项目规划技术、财政支持以及伙伴关系安排，以便在机会之窗开启或危机发生时迅速部署资金机制，例如为实施或扩大规模提供资金，以活动或结果为条件的资金（即激励），现有资金承诺的更大相对份额，以及个人捐赠的集中机制在现有机构内设立新的协调中心，或让现有机构参与其中，如联合国特别代表（可能有区域代表和国家大使）、联合国政府间委员会或机构间工作组、高级别机构和全球观察站，以及“倡导者联盟”等互补团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如框架公约从更大的战略中提取要素<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支持国家行动，如框架、实施工具包、在各国选择并建立势力、制定国家承诺与计划、利用专门机构、分享最佳实践和跟踪进展支持气候行动，如明确的全球目标，建立和加强国家承诺的机制，以及强有力的实施框架用于大流行的防范和应对，如框架、治理机制、现有机构的参与、“恒温”能力、全球统筹以及迅速调整和扩大规模用于跨机构协调和“升级”，如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机构领导人、多边开发银行的行长和股东，调整其机构的规范、咨询和投资行动使用现有的机构权力，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第四条监督活动中对特定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
| 第二章：社会挑战的本质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一些全球委员会呼吁以更有可能产生行动的方式构建社会挑战的框架<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例如，框架是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问题（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例如，将可持续发展目标重新定位为关注儿童，并将温室气体排放视为对儿童未来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柳叶刀》委员会关于世界儿童的未来）例如，更全面地将青少年健康概念化，使青少年在现有和新的规划中处于中心地位，并主张“第二次机会”的年龄和“三重红利”机会（《柳叶刀》青少年健康和福祉委员会）例如，使用综合性和系统性的术语描述挑战，展示其内在联系与系统起源，证明协作工作平台的合理性，并促使人们关注双重责任和三重责任的行动（《柳叶刀》全球肥胖、营养不良和气候变化委员会）一些全球委员会呼吁采取方法应对社会挑战，以便这些行动更有可能产生影响<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例如，采用基本的综合干预措施应对挑战（Guttmacher-Lancet性与生殖健康与人人享有权利委员会）例如，对投资进行规划和排序，以增加各部门之间相互联系的益处（水问题高级别小组）例如，根据最佳证据，投资优秀产品、良好产品和有前途的产品（全球教育证据咨询小组）例如，框架作为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问题，需要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混合方法，以适应反馈循环并支持适应和学习（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一些全球委员会也呼吁将展望和创新作为应对社会挑战的证据的补充领域 |





第三章：决策和决策者——证据的需求

- 许多全球委员会建议呼吁**政府政策制定者**使用特定的政策工具应对社会挑战，但通常都未提及在选择或应用政策工具时政策制定者能够或应该如何应用证据
 - 例如，信息和教育工具，如公开报告进展和对健康和环境（全球海洋委员会）以及公平的影响（如全球适应委员会），并建立各种扫盲教育（如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小组）和开展教育或宣传活动的数字平台（世界卫生组织非传染性疾病问题独立高级别委员会）
 - 例如，自愿性工具，如框架、指南（如霍乱控制全球工作队），工具包、与专门机构的合作伙伴和网络
 - 例如，经济手段，如公共支出、合同、外部因素定价和真实成本核算（粮食和土地使用联盟）
 - 例如，法律工具，如处理标准的法规（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采购（全球互联网治理委员会）以及披露利益冲突和其他因素（药品获取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法规
- 一些全球委员会建议呼吁政府政策制定者使用特定的结构和程序，但通常都未提及在选择或应用政策工具时政策制定者能够或应该如何应用证据
 - 例如，跨部门决策机制（全球能效紧急行动委员会）和支持政策一致性的倡议（全球未来工作委员会）
 - 例如，参与式决策过程（健康决定因素、数据和决策三维委员会）
 - 例如，独立审计和监察员办公室（《柳叶刀》全球肥胖、营养不良和气候变化委员会）
 - 例如，国家计划
- 较少有全球委员会呼吁**组织领导者**—尤其是企业领导者—使用特定的方法应对社会挑战，但在此情况下，但通常都未提及在选择或应用政策工具时政策制定者能够或应该如何应用证据
 - 例如，原则承诺，如联合国全球契约原则和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商业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及扩大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原则（全球水与和平问题高级别小组）
 - 例如，使用创新金融工具，如外部因素定价（即反映环境和社会外部性的定价）、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的混合金融工具（即奖励实现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同时获得财务回报）、与可持续性相关的债务（即定价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前提）、为环境保护付费（为保护和管理自然的服务付费）（商业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的公私合营（境内流离失所问题高级别小组）
 - 例如，使用内部机制，如自我审计、设定招聘目标、通过绩效审查和与目标挂钩的薪酬激励管理人员（妇女经济赋权高级别小组）
- 一个全球委员会呼吁，希望组织领导者“支持合理的科学，并使用结果在其部门路线图中设定基于科学的目标”（商业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 较少有全球委员会呼吁**专业人士**独立于政府和组织来应对社会挑战，尽管有一个委员会呼吁专业人士促进循证的方法的应用（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
- 较少有全球委员会呼吁**公民**在应对社会挑战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 例如，公民需要了解自己的权益和权利，向服务提供者传达自己的需求与偏好，并具备健康和数据素养（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代《柳叶刀》优质医疗体系委员会）
 - 例如，鼓励作为意见领袖的公民同伴负责任地发挥作用，并追究决策者的责任（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
 - 例如，发展参与政策制定的能力（全球水与和平高级别小组）
- 一些全球委员会注意到其他人在支持公民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包括新闻工作者（境内流离失所问题高级别小组）和教师、警察、社区工作者和卫生专业人员等专业人士（《柳叶刀》青少年健康和福祉委员会）
- 一个全球委员会呼吁公民“通过公民报告卡、社区监督、社会审计、参与式预算、公民宪章和卫生委员会来加强社会问责”（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代《柳叶刀》优质医疗体系委员会）



第四章：研究、综合与指南——证据供给

- 许多全球委员会建议呼吁增加数据收集与共享，这是**数据分析**作为证据形式的基础，但是：
 - 很少关注所收集内容的简洁性、数据和数据分析的质量以及共享及时性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代《柳叶刀》优质医疗体系委员会是个例外）
 - 假设将进行可靠的数据分析，以为决策提供信息和支持问责制的方式呈现，包括关注公平性考虑
 - 未阐明数据分析能够很好地回答哪些类型的问题，也未阐明能够回答决策所需问题类型的证据形式
- 其中一些全球委员会建议呼吁采取与增加数据收集和共享以及平衡使用人工智能的利弊相关的具体行动（尽管不一定在数据分析背景下）
 - 例如，协调指标、建立监测系统和共享开放数据（全球适应委员会）
 - 例如，建立全球数据共享平台（全球海洋委员会和全球零核）和支持跨国比较的全球观测站（粮食安全和营养高级别专家小组和伦敦大学-《柳叶刀》移民和健康委员会）
 - 例如，监管人工智能（全球未来工作委员会），确保其设计方式能够解释行动并要求人类对这些行动负责（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
- 当涉及其他形式的证据时，建议倾向于增加**新证据**的流动，例如新评价（为防范和应对大流行提供资金的G20高级别独立小组），而不是呼吁增加新证据
 - 提高此类证据流的信噪比
 - 更好地利用现有证据
 - 合并多种形式的证据
- 一些全球委员会呼吁**评价**
 - 例如，评价什么是有用的（教育委员会；全球适应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柳叶刀》关于世界儿童未来委员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代《柳叶刀》优质医疗体系委员会；《柳叶刀》青少年健康和福祉委员会；《柳叶刀》妇女和心血管疾病委员会）
 - 例如，评估多个领域（如健康、经济和环境问题）和时间水平（健康决定因素、数据和决策的三维委员会）的影响
 - 例如，预先批准试验设计以应对突发卫生事件（未来全球健康风险框架委员会），并具备区域试验能力（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
 - 例如，评价疫苗、诊断措施和治疗措施等产品（全球健康危机特别工作组），尽管没有系统安排和实施策略，但能够为需要的人提供合适的产品
- 较少有全球委员会呼吁开展**行为/实施研究**
 - 例如，利用行为洞察力和行为经济学（全球能效紧急行动委员会；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
 - 例如，利用运动和其他战略改变行为，如食品标签（Champions 12.3），尽管未明确提及行为/实施研究的必要性
- 甚至有较少的全球委员会呼吁其他形式的证据，例如：
 - **建模**（Champions 12.3和《柳叶刀》全球肥胖、营养不良和气候变化委员会）
 - **定性见解**，在这种情况下支持社区参与的社会科学研究（全球健康危机工作队）
 - **证据综合**，在这种情况下针对于证据局限的优秀产品、良好产品和有前途的产品（全球教育证据咨询小组）
 - **指南**，在这种情况下，针对（非法）药物“调度”的循证指南（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
- 一个全球委员会呼吁使用多种形式的证据（食品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小组），另一个委员会则呼吁强制公布研究方案和结果，并强制分享匿名的患者个人数据（药品可及性高级别专家小组）



第五章：证据中介的作用

- 许多全球委员会呼吁**联合国系统**，包括其区域和国家办事处，更好地发挥其规范作用（如指南）和咨询作用（如对其成员国的技术支持），尽管证据很少被明确作为此类作用的必要基础（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柳叶刀》世界儿童未来委员会）
- 一些全球委员会呼吁加大对**其他类型证据中介的支持**，如支持农民的农业推广服务（Champions 12.3）
- 一些全球委员会呼吁证据中介可以使用的**策略类型**，尽管证据很少被明确作为此类策略的重点
 - 例如，共享取得成果和影响的示例，如通过同行教育（全球适应委员会）、辅导（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小组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代《柳叶刀》优质医疗体系委员会）以及利益共同体（网络空间稳定问题全球委员会）
 - 例如，审计结构、过程与产出以确定改善的机会（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
 - 例如，用可理解的方式包装信息，为经常被边缘化、处于劣势和受到歧视的群体提供额外的支持（Guttmacher-《柳叶刀》性与生殖健康及全民权益委员会）
 - 例如，通过事实核查和其他努力打击网上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抵制没有事实依据的说法（伦敦大学-《柳叶刀》移民和健康委员会）
 - 例如，维持知识共享平台（境内流离失所问题高级别小组）
 - 例如，维持快速响应请求的服务台（数字合作问题高级别小组）
 - 例如，决策者的能力建设（全球水与和平问题高级别小组），包括不同数字和其他类型的扫盲（流行病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
 - 例如，召开国家对话（全球适应委员会；水问题高级别小组）
- 一个全球委员会呼吁将提供建议与投入（如种子）分开，以加强对建议降低投入成本和促进其他目标的方法的激励（粮食和土地使用联盟）
- 另一个全球委员会呼吁让领导人对其集体影响承诺负责，这对于作为高效能证据支持系统一部分的证据中介来说是必要的（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



第六章：全球公共产品和公平分配能力的需求

- 一些全球委员会呼吁特定机构在**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如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尽管其并未涉及与证据有关的全球公共产品
 - 例如，为世界银行确立新的任务和融资承诺，促进全球公共产品的发展（多边开发银行未来高级别小组）
 - 例如，阐明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公共产品中的作用，以支持大流行防范和应对工作（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
 - 例如，鼓励ISO制定和采用国际标准（水问题高级别小组）
- 一些全球委员会呼吁提供与证据相关的全球公共产品
 - 例如，互联网（全球互联网治理委员会）
 - 例如，初级和中级教育、通信基础设施、新的质量措施以及此类措施的全球存储库（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代《柳叶刀》优质医疗体系委员会）
- 其他全球委员会呼吁采取可以被视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措施，并且这些措施可能与证据相关的产品有关，即使他们并未在报告中明确使用该语言
 - 例如，监管程序和标准的趋同（未来全球健康风险框架委员会）
 - 例如，统一标准（全球能效紧急行动委员会）
 - 例如，自愿标准（粮食和土地使用联盟）
 - 例如，具有适合课程和劳动力市场内容认证的通用数字学习平台，以及支持可携带的通用技能认证系统（教育委员会）
 - 例如，用于风险因素筛查的数字平台（《柳叶刀》妇女和心血管疾病委员会）
- 一些全球委员会呼吁**资源分配能力**，但并未涉及适当的分工（例如，联合国系统、其区域办事处和国家办事处各自最擅长做什么）
 - 例如，从互联网中获益-开放标准、公共接入点、可负担设备、为难民和残疾人提供住宿、接入指标，以及安全治理、开发和使用互联网的分配能力（全球互联网治理委员会）
 - 例如，实施《国际卫生条例》-自我评估、定期外部评估、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对这些评估公开讨论、实施支持的成本计算方法，并随着能力的成熟，向更广泛的侧重于加强卫生系统的方向过渡（全球卫生危机工作队）
- 其他全球委员会呼吁建立一个支持能力建设的中央机构（全球网络空间稳定问题委员会），并呼吁从学习途径和终身学习的角度进行思考（健康、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高级别委员会）

7.4 参考文献

1. United Nations. UN 2.0: Quintet of chang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21.
2. United Nations. Our common agenda: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21.
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ogether on the road to evidence-informed decision-making for health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A call to ac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
4. The Independent Panel for Pandemic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COVID-19: Make it the last pandemic.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
5. Global High-Level Panel on Water and Peace. A matter of survival. Geneva: 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2017.
6. 3-D Commission. Data, social determinants, and better decision-making for health: The report of the 3-D Commission. Boston: 3-D Commission; 2021.
7. Bapna M, Brandon C, Chan C, et al. Adapt now: A global call for leadership on climate resilience. Rotterdam: Global Commission on Adaptation; 2019.
8. Clark H, Marie Coll-Seck A, Banerjee A, et al. A future for the world's children? A WHO-UNICEF-Lancet Commission. *The Lancet* 2020; 395: 605–658.
9. High Level Panel of Experts on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Nutrition and food systems. A report by the High Level Panel of Experts on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of the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 Rom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2017.
10. Kruk ME, Gage AD, Arsenault C, et al. High-quality health systems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ra: Time for a revolution. *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2018; 6(11): 1196-1252.
11. Patton GC, Sawyer SM, Santelli JS, et al. Our future: A Lancet Commission on adolescent health and wellbeing. *The Lancet* 2016; 287: 2423-2478.
12. The Education Commission. The learning generation: Investing in education for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Financing Global Education Opportunity; 2016.
13. Vogel B, Acevedo M, Appelman Y, et al. The Lancet women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ommission: Reducing the global burden by 2030. *The Lancet* 2021; 397(10292): 2385-2438.
14.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open science. Paris: UNESCO; 2021.
15. High Level Panel on Digital Interdependence. The age of digital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9.
16. 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y. The world drug perception problem: Countering prejudices about people who use drugs. Geneva: 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y; 2017.
17. Oppenheim J, Boyd O, Campbell G, et al. Better business, better world. London: Busi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 2017.
18.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et Governance. One internet. Waterloo: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2016.
19. World Bank. Global education evidence advisory panel.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21.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teachingandlearning/brief/global-education-evidence-advisory-panel> (accessed 28 October 2021).
20. Lipinski B. SDG target 12.3 on food loss and waste: 2021 Progress report. Washington: Champions 12.3; 2021.
21. Abubakar I, Aldridge RW, Devakumar D, et al. The UCL–Lancet Commission on Migration and Health: The health of a world on the move. *The Lancet* 2018; 392(10164): 2606-2654.
22. High Level Panel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Shining a ligh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Geneva: United Nations; 2021.
23. High Level Panel on Access to Medicine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access to health technologi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6.
24. Starrs AM, Ekeh AC, Barker G, et al. Accelerate progress –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for all: Report of the Guttmacher–Lancet commission. *The Lancet* 2018; 391(10140): 2642-2692.
25. Hart N. Podcast episode: Nick Hart on the Foundations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Act. 2021. <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27U5WaYXFy3bZkrWfbMyRD?si=3vJVlQFzSEayJ0ulaf4ucA&nd=1> (accessed 30 November 2021).